

海外华侨华人双重网络关系 与二元市场能力

——政策支持对调节作用

○郭惠玲 陈政勋

摘要: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以回国创业的海外华侨华人为研究对象,探究本土和海外双重网络关系对其适应与开拓中国市场能力的影响。结合国内创业政策环境,探讨国内政策支持的调节作用。通过308份回国创业海外华侨华人的有效问卷调查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海外华侨华人的本土网络关系和海外网络关系均对其回国创业的双元市场能力均具有积极正向的影响,但比较之下,本土网络关系对其回国创业的市场适应能力影响作用显著更强;(2)政策支持在本土网络对双元市场能力的正向影响路径中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3)政策支持在海外网络对双元市场能力的正向影响路径中起到了负向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 海外华侨华人; 双重网络关系; 二元市场能力; 政策支持

作者简介: 郭惠玲,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海外华侨华人创业、市场营销(E-mail: guohl@hqu.edu.cn; 福建泉州362000)。陈政勋,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海外华侨华人创业。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海外华侨华人三维网络对其在华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21BGL073)

中图分类号: F27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398(2023)02-0088-15

一 引言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推动了中国创新创业的新浪潮。在此基础上,中国侨商联合会推出“万侨创新”行动,得到了国务院的多次强调与倡导,激励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一方面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海外多国经济逐年下滑,尤其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海外各国的市场环境再次恶化;相反,中国国内经济运行总体稳定,经济发展质量逐年提高。另一方面中国各级政府部门相继出台各项惠侨政策,鼓励海外华侨华人归国创业,并为其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和政策支持,推动国内外经济双循环发展^①。然而,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面临着创业主场的转变,使其回国创业面临着诸多的困境与挑战^②。因此,如何更好地应对各种困境,使企业顺利进入国内市

收稿日期: 2022-07-18

① 许成磊、张超、郭凯、刘红琴《政策支持、创业激情与技术创业成功:政策感知的调节作用》,《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年第8期,第1—10页。

② 陈健、柳卸林、邱姝敏、高雨辰《海归创业的外来者劣势和知识资本的调节作用》,《科学学研究》2017年第9期,第1348—1358页。

场、站稳脚跟是绝大部分海外回国创业者所关心的实际难题。

伴随着国内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各行各业竞争激烈,行业壁垒逐年提高。对于海外华侨华人而言,回国创业的成功既需要适应国内市场需求、满足现有顾客,同时还需要不断挖掘潜在顾客、开拓新市场领域^①。因此,回国创业者的市场适应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成为其创业成功的关键因素。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创业者在社会网络中获取的特定资源,是创业个体拥有的独一无二的社会资本^②。与国内创业者相比,海外华侨华人具备“双重网络关系”,即在祖籍国的网络关系和在海外侨居国的网络关系^③,其中蕴含的庞大显性资源和隐性资源是普通创业者所不具备的^④。现有部分研究已发现双重网络关系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作用,但大多是以海归创业者为研究对象,极少有研究是针对海外华侨华人这一特殊群体,关于双重网络关系对海外华侨华人在中国市场的适应和开拓能力的影响也鲜少涉及。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就海外华侨华人的双重网络关系对其在中国市场适应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

对于回国创业的海外华侨华人,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政府的政策支持包括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扶持,前者侧重于提供直接的经济支持,比如税收优惠、减免非营利性税费、提供现金补贴和贴息贷款等;后者侧重于针对具体创业需求提供高效的服务,比如简化企业注册审批手续、提供贷款担保和技术指导、行业和产业知识培训、搭建合作网络平台等^⑤。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国与世界交流的重要桥梁,上述创业支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措施,其主要目的在于为海外华侨华人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推动国内外经济的双循环发展^⑥。因此,政策支持在海外华侨华人利用独特的海内外双重网络资源,提升自身适应和开拓中国市场能力的过程中,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回顾现有文献,还未能得到具体的结论。鉴于此,在探究海外华侨华人双重网络关系对二元市场能力的直接影响时,还将进一步探讨“政策支持”在上述影响路径中产生的边界作用。希望研究结论不仅能为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参考,还能为政府优化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环境的相关政策扶持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 理论回顾及研究假设

(一)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双重网络关系

社会资本这一词汇最早由社会学家 Bourdieu 提出^⑦,此后学界分别从结构、关系、特征、资源和能力等多个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探讨与概念界定。直至今日,学界较为追捧的概念界定当属 Nahapiet & Ghoshal 的定义,其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个体从社会网络中所获取的显性资源和潜在资源的总和,并从微观、中观和宏观等层面将社会资本的基础维度进一步分为了关系维度、结构维度和认知维度。其中,关系维度是指关系的嵌入性,体现为网络成员之间的联系频率和关系的强弱链接;结构维度主要关注的是网络的中心性,体现为网络成员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链接状况和

① 姚梅芳、黄一丛、葛宝山:《二元市场导向与组织绩效——创业导向的调节效应研究》,《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年1期,第50—54页。

② Koka B R, Prescott J E. Strategic alliances as social capital: A multidimensional view.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23 (9), pp. 795—816.

③ 李杰义、闫静波:《双重网络嵌入性对二元学习的均衡影响机制研究》,《软科学》2019年第1期,第72—75页。

④ 彭伟、唐康丹、符正平:《组织二元性视角下海归创业企业战略导向与双重网络嵌入关系研究》,《管理学报》2017年第11期,第1662—1671,1717页。

⑤ 何晓斌、柳建坤:《政府支持对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48—63页。

⑥ 马占杰:《逆向文化冲击与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意向》,《科学学研究》2022年,第1—16页。

⑦ Bourdieu P, Richardson J G.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The forms of capital*, 1986, 16 (6), pp. 241—258.

所处地位; 认知维度则是指网络成员之间的心理共知程度, 体现为不同网络主体之间的共享经历、共享文化和共性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 他们也指出社会资本的获取水平以及所能触及到的信息多数取决于个体的网络特征^①。对于回国创业的海外华侨华人而言, 他们既有通过血缘、宗缘与祖国长期保持着联系, 桥接起国内的本土社会资本, 又有以同种族、同信仰或同地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海外社会资本^②。本文借鉴何会涛等的研究, 将海外华侨华人的国内外社会资本定义为双重网络关系^③, 即海外华侨华人在祖国的本土网络关系和在侨居国的海外网络关系。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时, 这双重网络关系便是他们重要的、独特的社会资本^④。

(二) 二元市场能力

二元能力(ambidexterity)的概念由Duncan于1979年首次提出, 指企业具备有效运用当前资源以及适应未来变革的能力^⑤。在此基础上, March提出利用(exploitation)和探索(exploration)的二元能力理论, 并将其应用到组织学习领域。其中, 利用能力则形容企业在现有经营活动中, 通过运用已有知识和技能, 从事优化、改善、充实等活动的的能力; 探索能力即企业在现有经营活动外, 不断进行发现、创新、搜寻等活动的的能力^⑥。随着二元理论相关研究的不断发展, 不少学者将二元能力延展至市场领域, 包括用于满足顾客的显性需求与隐性需求的能力^⑦, 即利用式市场能力和探索式市场能力。其中, 利用式市场能力是企业对市场中现有顾客的进一步适应和开发, 反映企业对现有顾客价值的满足。探索式市场能力是企业对市场中潜在顾客的挖掘和开拓, 反映企业对潜在顾客价值的创造^⑧。鉴于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的实际市场情况, 利用市场能力本质是他们的市场适应能力, 探索式市场能力就是其市场开拓能力。这便是本文后续所指的双元市场能力, 前者是指创业者运用现有资源、经验和技能等对现有市场需求进行适应和满足的能力, 后者则是创业者积极创造、整合与运用全新资源、知识和技能等对潜在市场需求进行挖掘和开拓能力。这两种能力将直接影响归国创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情况^⑨。

(三) 海外华侨华人的双重网络关系与市场适应能力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国内经济迅猛发展, 市场需求日新月异, 海外华侨华人长期生活于海外侨居地, 回国创业时势必对国内市场环境、顾客喜好和消费习惯等存在认知缺失。与此同时, 作为新创企业, 回国创业者也面临着组织合法性不足、创业资源匮乏等多种挑战。在种种困境面前, 良好的本土网络关系将有助于回国创业者们克服以上问题, 从而顺利进入国内市场, 站稳脚跟^⑩。首先, 海外华侨华人可以通过本土网络关系搭建与国内顾客、供应商等主体间的沟通渠道, 获取现有市场的信息反馈, 从而弥补其国内市场的认知缺失, 进而通过不断优化企业产品及

① Nahapiet J, Ghoshal S. 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23(2), pp. 242-266.

② Rauch J E, Trindade V. Ethnic Chinese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2, 84(1), pp. 116-130.

③ 何会涛、袁勇志 《海外人才创业双重网络嵌入及其交互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管理学报》2018年第1期, 第66—73页。

④ McEvily B, Marcus A. Embedded ties and the acquisition of competitive capabilit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26(11), pp. 1033-1055.

⑤ Duncan R.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mplications for organizational design.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79, (1), pp. 75-123.

⑥ March J 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1, 2(1), pp. 71-87.

⑦ 戴万稳 《基于组织学习过程视角的市场导向理论及其系统整合》, 《管理学报》2014年第3期, 第344—350页。

⑧ Kim N, Atuahene-Gima K. Using exploratory and exploitative market learning for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0, 27(4), pp. 519-536.

⑨ 韩晨、高山行 《二元市场学习、原始性创新能力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研究》, 《研究与发展管理》2018年第1期, 第1—11页。

⑩ 严卫群、董彩婷、柳卸林 《国内创业网络对海归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 《科学学研究》2019年第5期, 第878—887页。

服务,适应国内市场需求、实现创业生存^①。其次,中国本土侨联社团、商业协会等平台组织的商业文化交流活动,有助于回国创业者结识更多的商业伙伴或同行竞争者,为获取创业资源提供了多种渠道和人脉,通过多渠道的资源获取,有效弥补新创企业资源匮乏的劣势^②。再次,与国内相关政府部门、服务机构的频繁沟通与联系,有助于回国创业者们更容易、更正确地解读和应用国内政策,这对于克服企业回国创业过程中的制度不适应,帮助企业获取组织合法性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③。因此,本文提出:

H1a: 本土网络关系正向影响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的市场适应能力。

同时,在当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国际市场环境动荡程度加剧,国内本土市场需求也早已呈现出层次化、多样化的特征,产品生产技术和营销服务手段更新速度明显加快^④。作为新创企业,回国创业者若想适应国内市场环境,还需发挥其海外网络关系的独特优势。首先,华侨华人在海外一直都有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回国创业势必会得到海外亲属侨眷的支持和鼓励。海外华人社团会为回国创业者提供各种可能的关系资源和平台,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国内市场,实现创业成功^⑤。其次,海外华侨华人可以通过与国外相关领域的科研机构、高校研究院等深入合作,学习和引进国外的前沿技术,生产或提供高品质的产品或服务,更高层次地满足现实市场需求^⑥。再次,回国创业者可以通过与海外同行企业交流与学习成熟先进的营销方法与管理经验,为其回国创业的产品或服务的市场运营模式提供新的思路,这对于企业更好地适应国内市场环境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⑦。因此,本文提出:

H1b: 海外网络关系正向影响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的市场适应能力。

如上所述,尽管双重网络关系对海外华侨华人在华市场适应能力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两种网络关系在网络成员构成、资源构成属性等方面均存在本质性差异,影响程度必然存在不同^⑧。首先,从网络成员构成的角度看,相较于海外网络关系,本土网络成员长期生活在国内,对国内市场环境有着更加全面的认知以及对国内现有消费需求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对于帮助回国创业者融入国内市场有着更积极影响作用^⑨。同时,由于创业所在地在国内,回国创业者与本土网络成员有着更加便捷的沟通方式和渠道,无论是沟通成本还是沟通效率都将明显优于海外网络^⑩。其次,从资源构成属性的角度看,相较于海外网络的国际性资源,本土网络所提供的本土化资源与国内市场环境有着更高的匹配度,有助于提升本土化创业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使回国创

- ① Rindfleisch A, Moorman C. The acquisition and utilization of information in new product alliances: A strength-of-tie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1, 65 (2), pp. 1-18.
- ② 贾俊英、龙登高、张姣 《华人国际社团组织力的拓展——基于“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的考察与解释》,《东南学术》2020年2期,第183—190页
- ③ Pruthi S. Social ties and venture creation by returnee entrepreneur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4, 23 (6), pp. 1139-1152.
- ④ 俞立平、金珍珍 《双循环背景下技术创新对国内国际市场影响研究——基于对高技术制造业的分析》,《现代经济探讨》2021年12期,第81—92页。
- ⑤ Obukhova E, Wang Y, Li J. *The Power of Local Networks: Returnee Entrepreneurs, School 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ual Meeting Proceedings, 2013.
- ⑥ Achcaoucaou F, Miravittles P, León-Darder F. Knowledge sharing and subsidiary R&D mandate development: A matter of dual embeddednes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4, 23 (1), pp. 76-90.
- ⑦ 侯佳薇、柳卸林、陈健 《海归创业网络、资源获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8年第1期,第168—180页。
- ⑧ 王海花、谢萍萍、熊丽君 《创业网络、资源拼凑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管理科学》2019年第2期,第50—66页。
- ⑨ Li J, Liu Y, Cao J. Effects of overseas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relationship learning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performanc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Mathematics*, 2017, 20 (6), pp. 1581-1586.
- ⑩ 吴航、陈劲 《国际搜索与本地搜索的抉择——企业外部知识搜索双元的创新效应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年第9期,第102—113页。

业者能够迅速利用现有的本土化创业资源来适应国内市场需求^①。综上,就海外华侨华人双重网络关系对其在华的市场适应能力的影响而论,本土网络关系的影响作用更强。因此,本文提出:

H1c: 相较于海外网络关系,本土网络关系对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的市场适应能力的正向影响更大。

(四) 海外华侨华人的双重网络关系与市场开拓能力

生存与发展是新创企业追求的两大目标,为了企业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创业企业在想方设法满足现有顾客需求的同时,还需不断挖掘和开拓新的市场领域,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②。开辟新的市场都需要经历市场机会探索、产品基础测试和渠道服务支持等过程^③,回国创业的华侨华人若想在原有市场基础上进一步开拓新的领域,势必需要深入本土环境,寻求国内各种力量的支持。首先,回国创业者通过与国内上下游、同行竞争者、科研机构等取得良好的联系,可以帮助企业获取到最新的行业信息,有利于及时追踪国内潜在市场的最新需求,实现对国内潜在市场机会的成功探索^④。其次,在新产品或服务推出市场前,需要通过国内的好友、侨属及其他合作伙伴的帮助,为新产品或服务进行市场基础测试,得到可靠的测试结果。同时,在产品基础测试阶段,回国创业者的本土网络关系嵌入越深,越能够得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技术支持和风险共担^⑤。再次,当新产品或服务进入市场时,同样也需要国内侨属、上下游、相关利益者、政府部门等本土网络各方面力量的渠道支持和宣传助力,为新产品或服务快速打开市场知名度,吸引更多的潜在消费者^⑥。综上所述,海外华侨华人的本土网络关系对于提升其对国内未知市场的探索及开拓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提出:

H2a: 本土网络关系正向影响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的市场开拓能力。

海外网络关系是海外华侨华人提升对中国潜在市场开拓能力的关键要素,是他们克服国内行业技术同质化困境、创造行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渠道^⑦。首先,海外网络关系中的资源异质性有助于回国创业者提出新概念、推出新产品、开创新模式,增强他们对中国潜在市场的探索能力。这将能帮助他们避免陷入国内同行企业同质化竞争的困境,创造属于自己的新天地^⑧。其次,正如 Dai 和 Liu 所说,海外网络嵌入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最前沿的技术知识,使企业保持技术领先的优势,促进企业的探索能力^⑨。通过海外的商业伙伴等进行跨国合作,不仅能帮助企业获得跨国资金支持,还能为企业引进前沿的营销模式和管理经验,帮助企业突破传统管理理念,去搜寻或尝试新的领域和新的机会^⑩。再次,如果回国创业者与海外网络成员沟通频繁,相互信任度高,这

- ① 齐昕、张军、金莉娜 《组织二元性学习与企业竞争优势——基于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软科学》2018年第6期,第78—82页。
- ② Kim N, Atuahene-Gima K. Using exploratory and exploitative market learning for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0, 27 (4), pp. 519 - 536.
- ③ Day G S. Closing the marketing capabilities gap. *Journal of marketing*, 2011, 75 (4), pp. 183 - 195.
- ④ Lazzaretto L, Capone F. How proximity matters in innovation networks dynamics along the cluster evolution. A study of the high technology applied to cultural good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6, 69 (12), pp. 5 855 - 5 865.
- ⑤ Lazzaretto L, Tavoletti E. Higher education excellence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of Twente.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05, 13 (3), 475 - 493.
- ⑥ 孙世强、陶秋燕 《网络嵌入、组织合法性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科技管理研究》2020年第6期,第171—179页。
- ⑦ 熊焰、杨博旭 《双重网络嵌入、制度环境与区域创新能力》,《科研管理》2022年第6期,第32—42页。
- ⑧ 吴绍玉、汪波、李晓燕、王栋 《双重社会网络嵌入对海归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年第10期,第96—106页。
- ⑨ Dai O, Liu X. Returnee entrepreneur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Chinese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9, 18 (4), pp. 373—386.
- ⑩ 袁勇志、肖方鑫 《双重网络嵌入对海外人才跨国创业的影响研究——基于创业阶段视角》,《工业技术经济》2013年第11期,第45—53页。

将能大大提升国内新创企业员工与海外相关机构的合作效率,降低沟通障碍,提升国际化资源传递的效率和有效性,使其新创企业更加有效地吸收消化前沿的国际化知识、经验和资源,提高其对国内潜在市场的开拓能力^①。综上,本文提出:

H2b: 海外网络关系正向影响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的市场开拓能力。

虽说海外和本土网络关系均对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的市场开拓能力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但市场开拓能力强调的是企业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更加注重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管理经验的领先^{②③}。一方面从网络成员的构成来看,海外华侨华人长时间远离故土侨居海外,通过血缘、地缘、业缘等所建立的海外网络关系强度会比本土网络关系更强,相互间的了解、信任和互助程度均更高,这对具有高风险特征的市场探索创新而言是一种更为关键的要素^④。另一方面从资源获取的角度来看,相较于本土网络关系,海外网络关系带来创新知识、领先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异质性程度更高,这对于激发企业创新思维、开拓市场新领域会具有更强的影响作用^⑤。综上,就海外华侨华人双重网络关系对其在华的市场开拓能力的影响而论,海外网络关系的影响作用更强。因此,本文提出:

H2c: 相较于本土网络关系,海外网络关系对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的市场开拓能力的正向影响更大。

(五) 政策支持的调节作用

创业政策支持的目的是促进创业成功,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部门相继出台各项政策,鼓励海外华侨华人归国创业,推动国内外经济双循环发展。国内政府对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提供政策支持,不仅能够降低国内市场对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项目的风险感知,增强对其创业成功的信心,也将推动回国创业者嵌入到本土网络关系,融入国内经济体系^⑥。一方面国内政府为回国创业者提供的物质性支持,如税收优惠、金融支持、费用减免等,有助于本土网络成员对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行为更为充满信心,更加愿意与其进行深度的项目合作、信息沟通交流以及创业资源共享^⑦。另一方面借助国内政府为海外华侨华人提供的非物质性支持,如搭建商务合作平台、办事流程简化、产业服务培训等,不仅帮助回国创业者快速了解国内市场、便捷获取资源,也大大降低了他们为联结和融入本土经济网络体系所需的时间和经济成本^⑧。综上,国内政府对回国创业者的相关政策支持在本土网络关系对其市场适应和开拓能力的积极影响作用中,都会产生锦上添花的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 政策支持增强本土网络关系对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的市场适应能力的正向影响。

H3b: 政策支持增强本土网络关系对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的市场开拓能力的正向影响。

然而,由于国内外政治体制的差异,政策支持作为我们国家的宏观调控因素,在对海外网络

① Sorenson S. How employee engagement drives growth. *Gallup business journal*, 2013, (1), pp. 1-4.

② Kim N, Atuahene-Gima K. Using exploratory and exploitative market learning for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0, 27 (4), pp. 519-536.

③ Luo Y, Tung R L.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of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 A springboard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 (4), pp. 481-498.

④ 吴晓云、王建平 《网络关系强度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不同创新模式的双重中介模型》,《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7年第7期,第155—166页。

⑤ 熊焰、杨博旭 《双重网络嵌入、制度环境与区域创新能力》,《科研管理》2022年第6期,第32—42页。

⑥ 何晓斌、柳建坤 《政府支持对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48—63页。

⑦ Lundström A, Stevenson L A. Entrepreneurship policy—Definitions, foundations and framework.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2005, pp. 41-116.

⑧ 李万君、李艳军、李婷婷、朱信凯 《政府支持如何影响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基于政策、组织和市场异质性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9期,第104—123页。

资源利用中,政策有效性会有所降低。一方面由于海外华侨华人长期侨居海外,早已习惯并融入当地的政治法律和文化生活环境,再次回到祖国时会感到种种不适应,正所谓“逆向文化冲击”。个体在海外越融入,回国时就可能会越不适应^①。如果回国创业者的海外网络嵌入越深,回国时就越难感知到国内政策支持的本意。如果中国与侨居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思想差异较大,回国创业的海外华侨华人甚至有可能对国内的创业支持政策产生误解,这对中国市场的适应和开拓无非是一种隐性障碍^②。另一方面虽然海外网络关系可以为回国创业者提供领先技术、先进经验和商业模式等异质性的创业资源^③,但这些异质性资源在中国特色的政策支持环境下更有可能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比如,许多海外先进管理经验与模式到中国来并没有体现出其先进性,反而不被中国所接受。当回国创业者的海外网络关系嵌入较深时,他们回国创业的模式、经验和技能越难以对中国市场产生“本土化”适应,国家越多的政策支持越容易加剧这种“水土不服”效应,出现政策失效^④。综上,本文提出:

H3c: 政策支持减弱海外网络关系对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的市场适应能力的正向影响。

H3d: 政策支持减弱海外网络关系对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的市场开拓能力的正向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假设,本文的理论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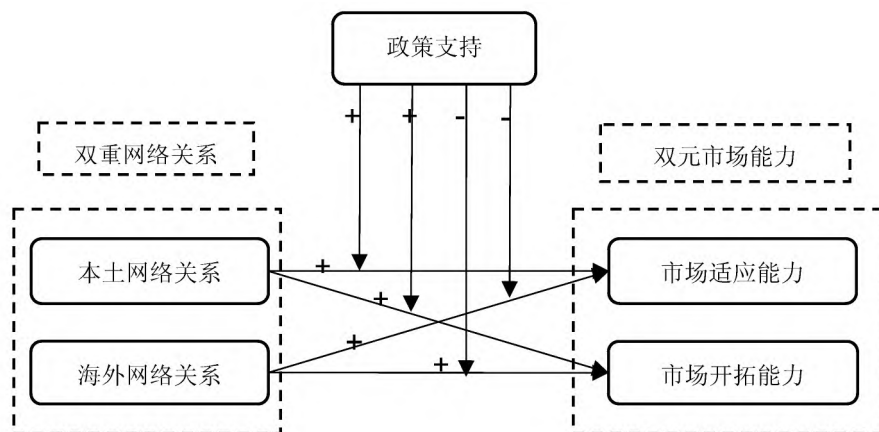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模型

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回国创业的新生代华侨华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人”是指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原中国公民及其外国籍后裔、中国公民的外国籍后裔^{⑤⑥}。由于这部分创业者的来源及分布范围广,其回国创办的企业绝大多数是非上市企业,新创企业的经营行为和业绩很难通过公开渠道的二手数据获得。因此,本文将采用方便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问卷调查方式收集相关数据。为保证调研对

① 马占杰 《逆向文化冲击与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意向》,《科学学研究》2022年,第1—16页。

② 汪艳霞、曹锦纤 《支持还是抑制?网络嵌入创业绩效有效性测量》,《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年第1期,第28—37页。

③ Dai O, Li X. Returnee entrepreneur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Chinese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9, 18 (4), pp. 373 - 386.

④ 郑焯、姬晴晴 《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国内外研究述评》,《经济体制改革》2018年1期,第175—182页。

⑤ 王丽霞、邓晓雅 《我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可视化分析——基于CSSCI(1999—2020年)数据》,《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6期,第25—34,127页。

⑥ 向大有 《论中共的华侨身份属性理念及中共与华侨的关系特征》,《八桂侨刊》2021年2期,第3—13页。

象符合研究要求,并获得更多的样本和调查支持,我们特别请求了部分地区相关政府机构和厦门、泉州、东莞、温州等地区侨商联合会给予帮助。首先,我们与三位回国创业多年的侨领取得联系,就他们回国后的创业经历和成果进行了深度的访谈。三位侨领均对此次调查研究给予充分的肯定;其次,在三位侨领和相关机构官员的引荐下,我们通过电话、网络视频、现场调研等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与53位回国创业的华侨华人开展小组座谈和调查问卷前测,并根据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对正式问卷进行最后的修改;最后,在华侨大学海外校友会、多位侨领以及厦门、泉州、东莞、温州等地区侨商联合会的帮助下,我们向500个符合要求的归国创业者发送了正式调查问卷的链接,并向其详细说明调查目的和答卷要求。历时半年,最后385个归国创业者成功提交问卷,通过问卷回答时长和测试题项排除等方法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有效问卷为308份,数据有效率为80.42%。问卷样本的基本情况详见表1。为了检测无反应偏差(Non-response Bias),根据答题时间的先后顺序,检测比较最先收集的30%问卷和最后收集的30%问卷是否有无显著不同。结果显示,这两组样本控制变量平均值无显著性差异($t=0.97, p>0.10$),因此可判断本研究问卷的无反应偏差问题不大。

表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N=308)

样本特征	特征分布	样本数量	所占比例
文化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9	2.90%
	大专	31	10.10%
	本科	202	65.60%
	硕士研究生	56	18.20%
	博士研究生	10	3.20%
所处行业类型	制造业	107	34.70%
	服务/贸易行业	101	32.80%
	高科技行业	29	9.40%
	金融/地产行业	20	6.50%
	文化、体育和娱乐行业	31	10.10%
	其他	20	6.50%
员工数量	100人及以下	147	47.70%
	101~300人	73	23.70%
	301~500人	48	15.60%
	501~1000人	28	9.10%
	1000人以上	12	3.90%
回国创业年份	2008年以前	68	22.08%
	2008—2020年以前	223	72.40%
	2020年以后	17	5.52%

(二) 变量测量

为了保证问卷质量,所涉及变量的测量均采用权威期刊已发表的成熟量表,信度、效度较高并得到广泛验证。每个测量题项均采用李克特7点刻度计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具体如下:

1. 双重网络关系。参考了解雪梅在文章中对网络的测量^①。从“网络信任”“网络稳固”“沟通频率”“信息有用性”“相互帮助”“共同解决问题”等6个方面来测量海外华侨华人的双重网络关系。

2. 二元市场能力。综合参考了韩晨和高山行对二元市场学习的测量^②,以及彭正龙等人对二元营销能力的测量^③,结合本文对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的二元市场能力的理论界定,采用“擅长循序渐进地改善现有的营销流程”“擅长遵循已有的经营理念和模式进行市场扩张”“擅长根据前期积累的市场经验提升营销效率”等3个题项测量了海外华侨华人在华企业的国内市场适应能力;从“擅长打破陈规开发全新的营销流程”“擅长基于前瞻性判断开发跟以往大不相同的商业模式”“擅长大胆冒险激进地探索新的经营领域”等3个题项测量了海外华侨华人在华企业的国内市场开拓能力。

3. 政策支持。参考了蔡莉等对政策环境支持的测量^④,采用“帮助创办企业”“提供订单”“特殊的鼓励政策”“提供资助”“帮助重新开始”等5个题项测量政策支持这一变量。

除了上述主要变量的测量,本文还测量了可能影响因变量的相关因素,如回国创业者的文化教育程度、企业所处行业类型、企业员工数量和回国创业年份等,这些因素均有可能影响其新创企业在中国市场的适应和开拓能力,因此问卷中也包含了上述因素的测量。

四 假设检验与分析

(一) 信效度检验与相关性分析

1. 信效度检验

采用了SPSS 26.0对各变量的信效度进行了检验。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各变量的Cronbach's α 均大于0.8,这也说明了变量的量表信度较高。通过对各变量进行因子检验,得出因子载荷均在0.672~0.919之间,且Bartlett球状检验结果的显著性为0.000,说明本文的量表内容效度良好。根据所得的标准化因子载荷数值,计算了各变量的组合信度(CR)和平均萃取方差(AVE),发现各变量的CR值均大于0.7,说明量表的组合信度较好;AVE值均大于0.5,说明量表的收敛信度较好。同时,变量与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显著且相关系数均小于AVE的平方根值(见表4),由此可见本研究模型各变量之间均存在较强的区分效度。

为进一步确认量表的结构效度,采用AMOS 24.0软件对各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五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X^2/df 为1.796,CFI为0.959,IFI为0.959,TLI为0.953,RMR为0.078,RMSEA为0.051)最高且均达到拟合标准,对比参考值^⑤可以看出其适配度显著优于其它模型,这五个构念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整体研究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度良好。

2. 相关性分析

采用了SPSS26.0对研究模型中的所有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见表4):第一,

① 解学梅、王宏伟《网络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一个基于非研发创新的有调节中介模型》,《管理工程学报》2020年第6期,第13—28页。

② 韩晨、高山行《二元市场学习、原始性创新能力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研究》,《研究与发展管理》2018年第1期,第1—11页。

③ 彭正龙、何培旭、李泽《二元营销能力平衡、战略地位优势与新创高技术服务企业绩效》,《管理科学》2015年第3期,第115—129页。

④ 蔡莉、朱秀梅、刘预《创业导向对新企业资源获取的影响研究》,《科学学研究》2011年第4期,第601—609页。

⑤ 吴明隆《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第2版)》,《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

表2 信度和效度分析统计

变量	信度		效度	
	Cronbach's α	CR	AVE	因子载荷
本土网络关系 1	0.906	0.908	0.634	0.672
本土网络关系 2				0.740
本土网络关系 3				0.738
本土网络关系 4				0.820
本土网络关系 5				0.848
本土网络关系 6				0.853
海外网络关系 1	0.915	0.914	0.656	0.701
海外网络关系 2				0.678
海外网络关系 3				0.716
海外网络关系 4				0.734
海外网络关系 5				0.913
海外网络关系 6				0.919
政策支持 1	0.922	0.922	0.704	0.848
政策支持 2				0.837
政策支持 3				0.824
政策支持 4				0.857
政策支持 5				0.830
市场适应能力 1	0.807	0.809	0.586	0.818
市场适应能力 2				0.729
市场适应能力 3				0.743
市场开拓能力 1	0.847	0.846	0.647	0.848
市场开拓能力 2				0.739
市场开拓能力 3				0.822

表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df	CFI	IFI	TLI	RMR	RMSEA
五因子模型	1.796	0.959	0.959	0.953	0.078	0.051
四因子模型 a	3.097	0.890	0.891	0.876	0.110	0.083
三因子模型 b	4.564	0.810	0.811	0.788	0.157	0.108
二因子模型 c	8.691	0.587	0.589	0.543	0.214	0.158
单因子模型 d	10.075	0.510	0.513	0.461	0.228	0.172
参考值	[1, 5]	>0.900	>0.900	>0.900	<0.080	<0.080

注: a 将市场开拓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 b 在 a 的基础上将政策支持进行合并; c 在 b 的基础上将海外网络关系进行合并; d 将所有项目归属于同一个潜在因子。

本土网络关系、海外网络关系均与市场适应能力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r = 0.552^{***}$; $r = 0.481^{***}$), 初步验证了 H1a 与 H1b。第二, 本土网络关系、海外网络关系均与市场开拓能力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r = 0.404^{***}$, $r = 0.356^{***}$), 初步验证了 H2a 与 H2b。

(二)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了周浩和龙立荣的共同方法偏差的检查方式。通过匿名测量以及部分题项反向等控制措施从程序上控制共同方法偏差。同时, 对收集到的数据采用了 Harman 单因素检验方法对共同方

表4 各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变量间相关系数

潜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本土网络关系	5.450	0.761	0.796				
海外网络关系	5.086	0.994	0.581***	0.810			
政策支持	4.974	1.279	0.557***	0.537***	0.839		
市场适应能力	5.625	0.845	0.552***	0.481***	0.456***	0.765	
市场开拓能力	4.948	1.184	0.404***	0.356***	0.310***	0.336***	0.804

注: $n = 308$;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斜角线上的数字为 AVE 的平方根。

法偏差进行了统计检测^①, 结果显示, 共有4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 其中最大的因子方差解释率为24.6% (小于40%), 因此, 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三) 假设检验

通过对本土网络关系、海外网络关系、市场适应能力、政策支持等变量进行层次分归分析。其中, 因变量为市场适应能力, 控制变量为行业类型、创业年份、员工数量、创业者文化教育程度, 自变量为本土网络关系、海外网络关系, 调节变量为政策支持。得到分析结果(见表5)。

表5 层级回归统计结果

	市场适应能力					
	M_1	M_2	M_3	M_4	M_5	M_6
控制变量						
行业类型	-0.034	-0.007	-0.015	-0.004	-0.004	-0.008
创业年份	0.124**	-0.005	0.081	-0.003	-0.003	-0.005
员工数量	0.206***	0.074	0.083	0.05	0.050	0.036
文化教育程度	0.182***	0.059	0.120**	0.054	0.053	0.049
自变量						
本土网络关系		0.623***		0.549***	0.547***	0.575***
海外网络关系			0.431***	0.138**	0.137**	0.147**
调节变量						
政策支持					0.004	-0.013
调节作用						
本土网络关系* 政策支持						0.100**
海外网络关系* 政策支持						-0.107**
R^2	0.095	0.435	0.259	0.447	0.447	0.458
Adjusted R^2	0.083	0.425	0.247	0.436	0.434	0.442
F	7.958***	46.317***	21.047***	95.265***	0.005	3.133**

注: $n = 308$;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

第一, 本土网络关系、海外网络关系均对市场适应能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4, $\beta = 0.549^{***}$, $\beta = 0.138^{**}$), 因此 H1a、H1b 得到验证支持。第二, 根据回归模型4, 本土网络关系对市场适应能力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都要大于海外网络关系对市场适应能力回归结果(模型2, $\beta = 0.549^{***} > \beta = 0.138^{**}$), 因此 H1c 得到检验支持。同时参照了周柳保^②的检验方法, 比较了本土网络关系和海外网络关系对市场适应能力的影响差异: ΔR^2_{M4-M2} 是在本土网络关系基础上加入海外网络关系之后模型解释市场适应能力的变化 ($\Delta R^2_{M4-M2} = R^2_{M4} - R^2_{M2} = 0.012$), ΔR^2_{M4-M3} 是在

① 周浩、龙立荣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2004年第6期, 第942—950页。

② 周柳保、赵文红、舒成利、黄姗姗 《同源异效? ——发明激情和发展激情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 《外国经济与管理》2021年第12期, 第85—99页。

海外网络关系基础上加入本土网络关系之后模型解释市场适应能力的变化 ($\Delta R_{M4-M3}^2 = R_{M4}^2 - R_{M3}^2 = 0.188$), ΔR_{M4-M3}^2 (0.188) 大于 ΔR_{M4-M2}^2 (0.012) 这说明了与海外网络关系相比,本土网络关系对市场适应能力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强,进一步验证了 H1c。第三,政策支持在本土网络关系对市场适应能力的影响路径中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模型6,交互项系数 $\beta = 0.100^{***}$),因此 H3a 得到检验支持。第四,政策支持在海外网络关系对市场适应能力的影响路径中产生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模型6,交互项系数 $\beta = -0.107^{***}$),因此 H3c 得到检验支持。

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政策支持在双重网络关系与市场适应能力间中起到的调节作用。本文以政策支持的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后的值为高政策支持调节和低政策支持调节,以此绘制了政策支持调节作用的简单斜率图。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政策支持增强了本土网络关系对市场适应能力的促进作用,但却削弱了海外网络关系对市场适应能力的促进作用。因此,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H3a 和 H3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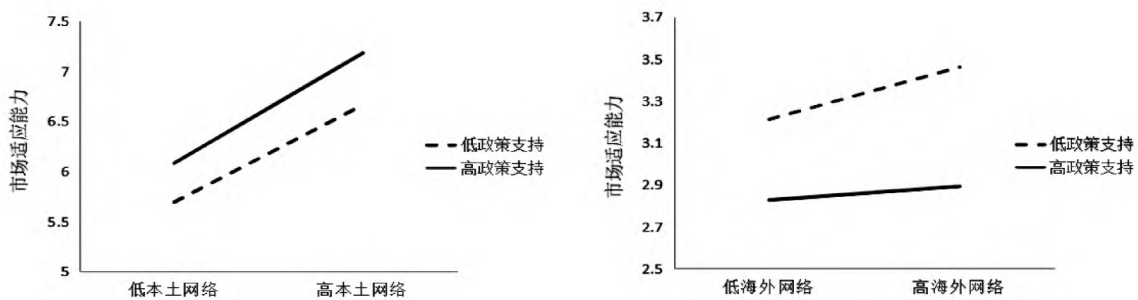


图2 政策支持在双重网络关系与市场适应能力间的调节作用

通过对本土网络关系、海外网络关系、市场开拓能力、政策支持等变量进行层次分归分析。其中,因变量为市场开拓能力,控制变量为行业类型、创业年份、员工数量、创业者文化教育程度,自变量为本土网络关系、海外网络关系,调节变量为政策支持。得到分析结果(见表6):第一,本土网络关系、海外网络关系均对市场开拓能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4, $\beta = 0.299^{***}$, $\beta = 0.209^{***}$),因此 H2a、H2b 得到验证支持。第二,根据回归模型4,本土网络关系对市场开拓能力的回归系数要大于海外网络关系对市场开拓能力的回归系数(模型4, $\beta = 0.299^{***} > \beta = 0.209^{***}$),因此 H2c 未得到检验支持。同样采用周柳保的检验方法对 H2c 进行了二次检验,比较了本土网络关系和海外网络关系对市场开拓能力的影响差异: ΔR_{M4-M2}^2 是在本土网络关系基础上加入海外网络关系之后模型解释市场开拓能力的变化 ($\Delta R_{M4-M2}^2 = R_{M4}^2 - R_{M2}^2 = 0.027$), ΔR_{M4-M3}^2 是在海外网络关系基础上加入本土网络关系之后模型解释市场开拓能力的变化 ($\Delta R_{M4-M3}^2 = R_{M4}^2 - R_{M3}^2 = 0.055$), ΔR_{M4-M3}^2 (0.055) 大于 ΔR_{M4-M2}^2 (0.027) 这说明了与本土网络关系相比,海外网络关系对市场开拓能力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弱,因此假设 H2c 依旧未得到检验支持。第三,政策支持在本土网络关系对市场开拓能力的影响路径中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模型6,交互项系数 $\beta = 0.190^{**}$),因此 H3b 得到检验支持。第四,政策支持在海外网络关系对市场开拓能力的影响路径中产生显著的负向调节(模型6,交互项系数 $\beta = -0.153^{**}$),因此 H3d 得到检验支持。

同样以政策支持的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后的值为高政策支持调节和低政策支持调节,从而绘制调节作用的简单斜率图,直观地展示政策支持在双重网络关系与市场开拓能力间中起到的调节作用。如图3所示,可以看出政策支持增强了本土网络关系对市场开拓能力的促进作用,但却削弱了海外网络关系对市场开拓能力的促进作用。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H3b 和 H3d。

表6 层级回归统计结果

	市场开拓能力					
	M_1	M_2	M_3	M_4	M_5	M_6
控制变量						
行业类型	0.036	0.054	0.052	0.058	0.058	0.055
创业年份	0.157***	0.072	0.120**	0.075	0.073	0.07
员工数量	0.076	-0.011	-0.028	-0.046	-0.047	-0.073
文化教育程度	0.023	-0.059	-0.030	-0.066	-0.067	-0.071
自变量						
本土网络关系		0.412***		0.299***	0.292***	0.343***
海外网络关系			0.369***	0.209***	0.206***	0.214**
调节变量						
政策支持					0.015	0.003
调节作用						
本土网络关系* 政策支持						0.190**
海外网络关系* 政策支持						-0.153**
R^2	0.029	0.177	0.149	0.204	0.205	0.236
Adjusted R^2	0.016	0.163	0.135	0.188	0.186	0.213
F	2.221*	12.939***	10.512***	33.148***	0.043	6.218***

注: $n = 308$;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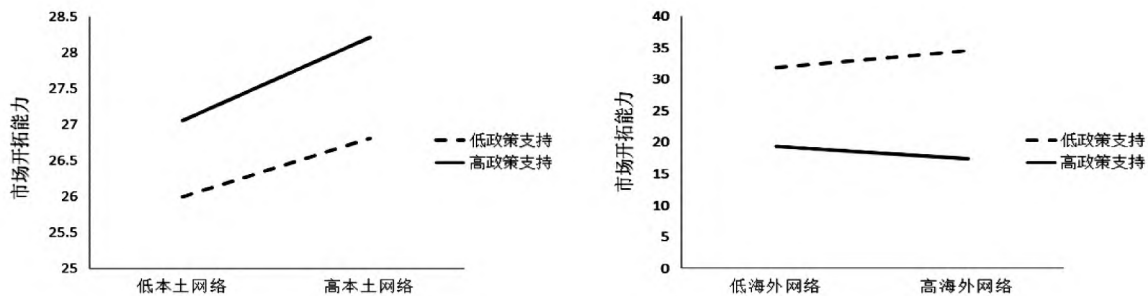


图3 政策支持在双重网络关系与市场开拓能力间的调节作用

五 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双元能力理论,以回国创业的海外华侨华人为研究对象,探究了海外华侨华人双重网络关系对其回国创业的双元市场能力的影响作用,并且进一步探讨了政策支持在上述作用中可能产生的调节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本土网络关系与海外网络关系,均对海归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的市场适应能力和开拓能力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相较于海外网络关系,本土网络关系对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的市场适应能力和开拓能力都会产生更大的正向影响。我们进一步思考H2c没有得到验证,实证研究结果反而出现“海外网络关系对市场开拓能力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弱”的原因应该是:虽然海外网络关系为回国创业者提供更为创新性和差异化的创业资源,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一特定市场体制环境下,这些资源未必能够为其创建被市场所认可和接受的优势,甚至有可能会由于政策环境的“水土不服”导致资源效用不能充分有效发挥。并且,中国政府为了鼓励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为他们也搭建了诸多合作平台和侨联社团,通过本土的网络关系同样也能对接到很多海外的创新性资源和机会。因此,对回国

创业的海外华侨华人而言,本土网络关系对其中国市场的适应和开拓能力都更为重要。(2)在本土网络关系对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的市场适应能力和开拓能力的影响作用中,中国的政策支持会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说明政策支持在本土网络关系中的有效性显著提升。(3)相反,在海外网络关系对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的市场适应能力和开拓能力的影响作用中,政策支持产生显著负向调节,说明政策支持在海外网络关系中的有效性显著下降。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1)以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为研究切入点,探究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的市场适应和开拓能力的形成和影响机制,这对国内学术界现有多数聚焦于“华侨华人海外创业”的研究将形成有效补充;(2)结合营销探索和开发能力的概念,将二元性理论延伸到探索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的市场行为能力方面,这是现有关于二元能力研究的创新性延展^①。提出并得到验证的“本土和海外双重网络对二元市场能力的影响作用差异对比”结论,既与现有学术界关于“双重网络均具有一致性影响作用”结论一致^②,又提出了更深层次的影响逻辑,进一步完善了双重网络关系的相关研究;(3)政策支持作为国家宏观把控的市场因素,在双重网络关系与二元市场能力中起到了显著的调节效应,但调节方向却明显不同。这不仅说明了双重网络关系与二元市场能力有效匹配的边界条件,也为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实践提供了更为明确的理论指导。

本研究揭示了双重网络关系对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二元市场能力的影响作用差异,并探究政策支持所产生的边界影响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提升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成功率,促进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和“双循环”经济发展格局的形成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1)海外华侨华人长期旅居海外,回国创业时面临着对国内体制的不了解以及营商环境的不适应,应该借助一切资源和机会,构建国内本土的网络关系,在帮助其尽快适应中国市场和体制环境,克服其新创弱性的同时,也可以从中洞悉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和趋势,提前布局新的市场发展领域;(2)虽然海外网络关系能够为回国创业者带来异质化程度较高的资源优势,对其在中国市场的适应和开拓能力也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作用,但是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环境下,海外网络中的资源会存在一定的“外来局限”和“不适应”。相对比之下,本土网络的正向影响作用都更为显著有效,因此,海外华侨回国创业时应该加快对国内本土环境的融入,加强与国内相关领域的合作;(3)关于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的政策支持往往是我国政府基于更好地推动国内经济发展的宏观政策措施,为了推动国内经济大循环,具体的政策内容与国内本土网络中的资源匹配度更高,可以使其作用发挥到最大。相反,海外网络关系中的资源很多来自西方国家,与国内市场的环境不匹配程度高应该引起重视,在引进海外资源时,要注意将其“本土化”处理,才能有效避免其带来的副作用。

(二)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方面尚未考虑到回国创业者的类型、动机及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考虑进一步研究就“老侨”和“新侨”不同的回国创业动机及文化差异所产生的影响差异;另一方面仅仅从本土与海外这双重网络的关系维度出发,没有涉及其结构维度和认知维度,未来研究可以从网络的结构维度和认知维度进行探讨,对海外华侨华人双重网络的影响作用进行更全面的研究。此外,由于海外华侨华人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缺乏相应的具有

① 韩晨、高山行《二元市场学习、原始性创新能力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研究》,《研究与发展管理》2018年第1期,第1—11页。

② 吴绍玉、汪波、李晓燕、王栋《双重社会网络嵌入对海归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年第10期,第96—106页。

时间跨度的二手数据,本研究是基于一手调研的横截面数据的研究,问卷样本数量有限,动态性不足,后续还需要进行相应的动态追踪以确保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Dual Network Relationship and Ambidextrous Market Capability of Overseas Chinese: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Policy Support

GUO Hui-ling, CHEN Zheng-xun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dual network relationships between local and overseas Chinese who return to China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on their ability to adapt and expand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and the regulatory role of domestic policy support by combining the domestic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environment. Through a valid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308 overseas Chinese returning to China for entrepreneurship,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both the local network relationship and overseas network relationship of overseas Chinese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ambidextrous market capability to return home for entrepreneurship, but in comparison, the local network relationship has a stronger impact on their market adaptability to return home for entrepreneurship; (2) Policy support plays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in the positive impact path of local network on ambidextrous market capability; (3) Policy support plays a negative moderating role in the positive impact path of overseas network on ambidextrous market capability.

Keywords: overseas Chinese; dual network relationship; ambidextrous market capability; policy support

【责任编辑:吴应望】

(上接第 23 页)

The Subject Controversy and Practical Logic of AI in Digit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UANG Shan-shan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o bring out facts and reasons. “Who makes sense” and “how to make sense” are a brand new issue facing digit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involves how to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such as AI. Since AI systems are lack of social attributes of communicative subjectivity and conscious activity, they can just be used as a consulting toll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a technical intermediary, AI can enable teachers to “deepen” the truth and reas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pand the practical field of “activating” the principle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help students “comprehend” the principle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AI, build an AI centered on teachers and student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of teachers applying AI system, implement algorithm models from interpretability to trustworthy, and finally achiev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I application technology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words: digit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I; subjectivity; technical intermediary, interpretability

【责任编辑:龚桂明】